

澳大利亚语言政策研究

A Study on Language Policy in Australia

王辉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澳大利亚语言政策研究

A Study on Language Policy in Australia

王 辉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澳大利亚语言政策研究 / 王辉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0. 11

ISBN 978 - 7 - 5004 - 9326 - 6

I. ①澳… II. ①王… III. ①语言政策 - 研究 - 澳大利亚
IV. ①H310. 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30172 号

出版策划 任 明

特邀编辑 董 佳

责任校对 王兰馨

封面设计 郭蕾蕾

技术编辑 李 建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 - 84029450 (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奥隆印刷厂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0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7.875

插 页 2

字 数 220 千字

定 价 2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我们需要研究世界

——序王辉《澳大利亚语言政策研究》

我认识王辉，是在2004年的第四届全国社会语言学学术研讨会上。

那年的10月16日，有点过节的感觉。各级领导、语言学界的专家学者、语言文字工作者、欧盟的朋友济济一堂，在人民大会堂云南厅庆祝我国普通话水平测试开展10周年、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成立20周年、国家语委普通话培训测试中心成立10周年，并举行第四届全国社会语言学学术研讨会开幕式。之后移师中国传媒大学，社会语言学学术会议继续召开。

会议期间，周玉忠教授和王辉送给我他们主编的《语言规划与语言政策：理论与国别研究》。这是一部很有学术价值的语言规划论文集，虽然他们供职的宁夏大学，地处人们心目中的西鄙之地。王辉当时还提出了跟我读博的要求。我当时就同意他报考，因为我当时的学术兴趣已经放在了语言规划上，我也希望为西部的发展尽微薄之力。2006年我在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南开大学和中国传媒大学招收了四名博士研究生：王辉、王春辉、于辉、李英姿，人称“一英三辉”，事情还真有这么凑巧的。

王辉选择澳大利亚的语言政策作为博士论文的研究对象，我很赞成。澳大利亚语言资源十分丰富，多元文化和睦共处，语言生活比较和谐，语言规划理念有独到之处，语言政策较为开明，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王辉边工作边读博，还肩负着家庭重担，他能够按时完成博士论文，得益于熟练的英语、笼天罩地的互联

网和澳大利亚的学术朋友，这些使他能够得到较为充足的研究素材，使他身在中国而能眼观澳洲。今年春节过后，王辉应邀同我一起访问澳大利亚，亲身感受那里的地理人文，实地考察澳洲的语言政策和语言生活，这对于论文的修改大有裨益。而今，得知王辉的博士论文即将付梓，我自然是很高兴。

王辉的博士论文《澳大利亚语言政策研究》，全面研究了澳大利亚语言政策的发展变迁。1788年白人踏上澳洲这块土地，到1901年澳大利亚建国，澳大利亚还没有明确的语言政策，是“放任性的”。建国之后的澳大利亚实行“白澳政策”，对有色人种及其语言采取歧视态度，土著人民及少数族群的语言受到强烈排斥和严格限制，造成了当地语言的大量濒危和消亡。在上世纪70年代，澳大利亚就改变了英语同化政策，但是直到2008年2月13日，陆克文总理在国会才正式向土著人民道歉。1970年~1990年，是澳大利亚语言政策的黄金时期。这一时期实行多元文化政策，提出要保护和开发澳大利亚的语言资源，每个公民除了英语之外还要学习另外一种语言，要用客户能够理解的语言提供服务，要支持土著语言和海峡岛语言。1990之后，澳大利亚要求优先发展学生的英语读写能力，以保证英语的官方地位。促进对汉语、日语、印尼语和韩语等亚洲语言的学习，加强同亚洲主要国家的交流能力。此期的语言政策，主要通过语言教育规划来体现，侧重于英语的优先地位，侧重于语言的经济价值，侧重于同亚洲发展关系。

澳大利亚100多年的语言政策，王辉把它梳理为“放任政策”“同化政策”“文化多元政策”和“优先化政策”四个阶段，并从语言问题、语言资源、语言权利等角度分析澳大利亚语言政策制定和变化的动因。王辉还概括出了语言权利、语言资源和语言问题这三种意识的强弱与政府采取何种语言政策的关系，比如：当侧重于把语言看作问题时，政府倾向于采取语言同化政策；当语

言资源、语言权利的意识较强时，政府倾向于采取多元化政策以均衡各语言间的关系；当这三个方面都受到重视时，政府倾向于采取“优先化”的语言政策。

这种对应关系，提供了分析各种语言政策的框架。世界各国的语言政策有同有异，也许不一定都能装进这一框架中，在利用这一框架对世界不同类型的语言政策进行分析时，当然应当对这一框架进行修正。提出这一框架的意义，就某种意义而言，或许不在于其解释力有多强，而在于通过澳大利亚这一个案的研究抽绎出规律性框架的努力，以及尝试利用这一框架去观照世界语言政策的理论意识。

《礼记·学记》说，“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认为可以“教学相长”。在本科教学和研究生教学的生涯中，我深深体会到《学记》的这些见解是多么的深刻。近些年来，我的多位博士研究生做语言规划方面的论文，在指导他们论文的过程中，我也开阔了眼界，深入思考了不少问题，获取了许多“教益”（因教学而得到的收益）。王辉的论文使我对澳大利亚的语言政策有了更多的理性思考，并强烈感受到：我们需要研究世界。

就语言规划领域而言，我国对世界语言生活的知识还是相当贫乏的。全世界有五六千种语言，我国能够了解的外语大约只有百种左右；全世界有200来个国家和地区，我们仅了解一些具有典型性的语言政策，比如美国、法国、前苏联、加拿大、土耳其、印度、日本、越南、新加坡等国的语言政策；西方近50年来语言规划理论取得了长足进展，但我国对这些成果的译介还相当有限。

中国正在由“本土型”国家开放为“国际型”国家，国际型的国家要求我们必须研究世界。研究世界有远近两个目标：近目标是借鉴国际上的经验与教训，用更为宽阔的世界眼光来看中国，把中国现在的事情办好，把中国未来的事情计划好。远目标是履行一个大国的国际义务，同国际社会一道把世界的事情办好。中

国的事情不仅在国内，也在国外。随着我国的国际化水平的提高，在国内、国外两个大局中，国外这个大局会变得越来越重要，我们需要承担更多的国际义务，得到更多的国际话语权。我国在克服世界金融危机中所发挥的作用和中国海军的亚丁湾护航，是国外大局开始变得重要的两大标志。

不管是近目标还是远目标，我们对世界语言生活状况的了解都是远远不够的。全面研究世界的语言生活，窃以为起码应包括如下内容：1. 每个国家（地区）语言的种类、每种语言的基本面貌与使用活力；2. 每个国家（地区）的语言政策（包括外语政策）及其执行力；3. 向外传播本国语言的经验与举措；4. 语言规划的机构、运作与学科发展状况；5. 国际组织的语言态度及语言使用状况。这些研究成果起码可以出版两套大型丛书：国别（包括国际组织）语言生活状况丛书；语言规划经典译丛。

今年，北京市高考的作文题目是《仰望星空与脚踏实地》。全面研究世界语言生活是巨大的文化工程，上面所谈有很多是“仰望星空”式的遐想，要真正实现，需要诸多学人“脚踏实地”地工作。

李宇明

2010年6月16日 端午节

于北京俱闲聊斋

目 录

序 我们需要研究世界	李宇明 (1)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选题意义	(1)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	(4)
第三节 创新性	(9)
第四节 研究方法	(10)
第五节 本书结构	(11)
第二章 澳大利亚国家与语言状况	(12)
第一节 澳大利亚国情概述	(12)
第二节 澳大利亚的语言状况	(18)
一 英语	(18)
二 土著与海峽岛居民语言	(20)
三 社区语言	(23)
第三节 澳大利亚语言政策发展进程	(25)
第三章 同化政策 (20 世纪初至 60 年代末)	(40)
第一节 放任与容忍: 20 世纪之前的语言政策回顾	(40)
第二节 限制与同化 (20 世纪初至 60 年代末)	(44)
第三节 20 世纪初至 60 年代末语言政策分析	(51)
第四章 文化多元政策 (20 世纪 70 年代至 80 年代末) ...	(62)
第一节 《Grassby 报告》	(62)
第二节 《Galbally 报告》	(64)

第三节 《参议院调查报告》	(67)
第四节 《国家语言政策》(1987)	(75)
一 《国家语言政策》的出台	(75)
二 《国家语言政策》的主要内容	(77)
三 《国家语言政策》的社会目标	(80)
四 语言服务政策	(82)
五 语言规划机构建设	(86)
六 《国家语言政策》资助项目	(88)
七 对《国家语言政策》的基本评价	(90)
第五节 20 世纪 70—80 年代末语言政策分析	(94)
第五章 优先化政策 (20 世纪 90 年代至今)	(107)
第一节 《绿皮书》	(107)
第二节 《白皮书》	(110)
一 《白皮书》的主要内容	(110)
二 语言规划机构建设	(117)
三 《白皮书》存在的问题	(118)
第三节 《澳大利亚国家学校亚洲语言与研究战略》	(121)
第四节 《国家读写能力规划》	(124)
第五节 澳大利亚 21 世纪之初的语言政策	(127)
第六节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语言政策分析	(133)
第六章 澳大利亚语言政策总体分析	(140)
第一节 英语、土著语言及社区语言百年来的政策 发展分析	(140)
第二节 澳大利亚语言政策特点总体分析	(144)
第三节 基于语言规划观的澳大利亚语言政策发展 模型	(148)
第七章 结语	(152)
第一节 主要研究内容	(152)

第二节 余论：对中国当前语言规划的启示	(153)
一 地位规划	(154)
二 语言资源观念	(155)
三 语言规划的目标	(156)
四 语言政策制定过程	(157)
五 语言服务	(158)
附录1 National Policy on Languages	(160)
附录2 澳大利亚的国家语言政策	(172)
附录3 Policy Information Paper on the Australian Language and Literacy Policy Companion Volume	(179)
附录4 Kevin Rudd's Apology to Australia's Indigenous Peoples	(183)
附录5 作者近年来发表的语言规划与语言政策相关文章 选录	(185)
参考文献	(226)
后记	(243)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选题意义

语言规划与语言政策^①是一个日益重要的研究领域。从学科发展来看,语言规划与语言政策研究虽然历史不长,但是在应用语言学中的地位非常重要。

Spolsky (2004) 认为:语言政策应该是应用语言学的核心所在。李宇明 (2005, 2007) 非常强调语言规划与语言战略在社会中的重要地位。国内将广义的应用语言学划分为四大部分,语言规划是其中之一^②。语言规划与语言政策的目的是解决社会中的语言问题。因此,这门学科具有重要的社会应用价值。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语言规划与语言政策都曾对社会发展产生过重要影响。语言规划与语言政策是社会语言学的一个年轻的分支学科,对其正式的学术研究发端于 20 世纪 60 年代,至今还不到 50 年时间。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新独立的国家试图通过语言规划与语言政策来帮助解决国家统一和现代化问题,早期的语言规划与语言政策的主要任务是选择和确定国语或官方语言,实现语言的标准化和现代化。当时语言规划与语言政策被看做一门在政治上中立的技术,语言统一和语言标准化被看做治疗社会问题的妙方。

① 对这个学科名称本书采用“语言规划与语言政策”的说法。详见本书第二章第三节的讨论。

② 参见于根元主编《应用语言学概论》,商务印书馆 2003 年版。

20 世纪 80 年代末以来,随着苏联解体、东欧新国家的产生、冷战结束、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瓦解、超国家组织——欧盟的扩展,西方,尤其是美国文化和科技对发展中国家的渗透——这些世界政治格局发生的巨大变化使语言规划与语言政策出现了新的研究主题和视角,在社会发展甚至国家安全等方面体现出了新的应用价值。随着人们对濒危语言、语言权利、语言生态、语言与全球化、语言与国家安全等问题的关注,语言规划与语言政策研究获得了新的生命力,成为一门复兴(resurgent)的学科,前景非常广阔。语言规划与语言政策成为拯救濒危语言、维护语言多样性、维护少数民族语言权利、促进社会和谐、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举措。

从现实的角度出发,语言规划与语言政策研究意义重大。“规划语言就是规划社会”^①。在全球化时代,语言规划与语言政策面临的环境更加复杂,因此也显得更加重要。从宏观来看,全球化使各个国家、组织、语言集团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更加明显。语言规划不再是一个国家内部的事,将成为跨越国家边界的语言协调行为。从微观来看,语言规划将更加以人为本,个人的语言选择和语言权利将受到更多的尊重。语言规划与语言政策将受到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成为一种极其复杂的社会行为。语言规划与语言政策的难度加大,其成败对一个国家来讲影响很大。

一些国家具有丰富的语言规划与语言政策的实践经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语言政策,对其社会和教育发展产生过重要的影响,非常有必要对其语言规划与语言政策进行总结、研究和借鉴。澳大利亚便是这样一个国家。

^① Cooper R., *Language Planning and Social Chan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182.

澳大利亚提供了一个典型的、特色鲜明的语言政策案例。20世纪70—80年代,澳大利亚着手制定目标清晰、兼容并蓄、文化多元的明确的国家语言政策,具有重要的社会影响。澳大利亚被公认为世界上语言规划最成功的国家之一,其语言政策的制定在国际上享有盛誉。当前中国的语言规划致力于构建和谐的语言生活,澳大利亚语言政策的丰富经验非常值得学习和借鉴。

本选题的研究意义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关注语言规划与语言政策的基本事实研究。

作为一门新的学科,学术界对语言规划与语言政策的研究还远不充分。事实上,这门学科并不是一门理论驱动的学术研究领域,它主要立足于解决社会中的语言问题。语言规划与语言政策研究发展至今,其理论还远未成熟。尽管世界各地语言规划与语言政策实践非常丰富,但是学者对其基本事实缺乏必要和全面的描写与解释,这也是语言规划与语言政策理论尚不能形成重大突破的根本原因。近年来,国际语言规划界意识到这一问题,相继出版了多部关于语言规划与语言政策的基本事实研究的著作,如著名学者 Kaplan 与 Baldauf 共同主编的“语言规划与政策”系列丛书中就包括了亚洲、欧洲、非洲、拉丁美洲及太平洋地区一些国家语言规划与语言政策的基本情况研究。从当前语言规划与语言政策研究的趋势来看,其研究将不再局限于亚洲、非洲的后殖民国家,发达国家的语言规划与语言政策也将备受关注。

澳大利亚是个典型的移民国家,其历史传统与欧洲密切相关,地理位置却又接近亚洲,对外贸易依赖亚洲。这些因素都对其语言规划与语言政策有重要影响。澳大利亚如何在复杂的背景下制定语言政策是非常值得研究的。澳大利亚作为一个典型的语言规划国家,应深入研究,从而为语言规划理论的提升提供有力的支撑。

二是充实中国语言规划与语言政策研究的内容,扩大国际

视野。

近些年来,中国的语言规划与语言政策日益得到关注,该领域的研究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学者或者对语言规划与语言政策的理论进行研究,或者对语言规划实践进行探讨,或者对其他国家的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进行介绍,形成了对语言规划与语言政策的多维的研究视角。但是中国对国外语言规划与语言政策的研究还远不够充分。一方面,对国外语言规划与语言政策的研究非常薄弱,缺乏深入、全面、系统的研究;另一方面,尚缺乏对实施语言规划与语言政策的典型国家的深入研究。此外,中国的语言规划与语言政策研究需要有国际视野,与国际同步,从而融入语言规划与语言政策研究的主流之中,为国际语言规划与语言政策研究作出应有的贡献。选择澳大利亚这样一个实施语言政策的典型国家进行研究将会丰富中国语言规划与语言政策研究的内容,扩大国际视野。

三是对中国当前的语言规划有重要的启示作用和借鉴意义。

当前,中国政府提出新世纪语言文字工作目标是构建和谐语言生活。中国的社会语言生活总体上是和谐的,但也有一些问题值得关注。如普通话和方言的关系、民族语言之间的关系、外语教育、濒危语言的保护、语言服务等。只有这些问题得到妥善解决,中国的语言生活才能更加健康和谐。澳大利亚 20 世纪 80 年代实施文化多元政策,倡导语言和谐,尊重土著人和少数民族群的语言权利,注重语言服务,这些做法和经验都将对中国应对当前语言生活中出现的问题有重要的启示作用和借鉴意义。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

国外在语言规划与语言政策领域有丰富的研究成果。表 1.1 是基于语言学与语言行为摘要数据库(LLBA)的数据统计,反映了

与“语言”、“语言规划”、“语言政策”、“语言规划或语言政策”主题相关的文献的数量。从中可以看出,这一领域的相关文献已有一定数量和比例。国外也出现了诸如 Cooper (1989), Tollefson (1991), Kaplan 和 Baldauf (1997) 等经典著作。

进入 21 世纪以来,语言规划与语言政策研究日益受到重视,先后出版了一些专门的刊物和学术著作,显示出这一领域的研究相当活跃。

2000 年 Kaplan 和 Baldauf 创办《当前语言规划的问题》(*Current Issues in Language Planning*) 期刊,2002 年 Spolsky 创办《语言政策》(*Language Policy*) 期刊。Wright (2004) 的《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从民族主义到全球化》(*Language Policy and Language Planning: From Nationalism to Globalization.*), Spolsky (2004) 的《语言政策》(*Language Policy*), Ricento (2006) 主编的《语言政策导论:理论与方法》(*An Introduction to Language Policy: Theory and Method*), Ferguson (2006) 写的《语言规划与教育》(*Language Planning and Education*) 及 Spolsky (2009) 写的《语言管理》(*Language Management*) 则是近年来这一领域研究的力作,集中反映了新世纪初的研究成果。这些刊物和著作的出版对语言规划与语言政策的研究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表 1.1 语言规划与语言政策研究文献统计

出版年份	语言	语言规划	语言政策	语言规划或语言政策	比例 (%)
1998 ^①	2307	71	31	82	35.5
1997	8490	309	240	417	49.1
1996	9943	396	232	491	49.4
1995	10526	323	181	395	37.5
1994	9994	293	172	369	36.9

① 1998 年的统计数据不全。

续表

出版年份	语言	语言规划	语言政策	语言规划或语言政策	比例
1993	9440	351	196	434	46.0
1992	8855	283	169	358	40.4
1991	8261	315	201	394	47.7
1990	7918	258	207	362	45.7
1989	6776	170	152	244	36.1
1989—1998	82500	2769	1781	3546	43.0
1988	5472	157	139	221	40.4
1987	5077	224	172	310	61.1
1986	4720	176	128	229	48.5
1985	3349	108	93	154	46.0
1984	3005	153	130	201	66.9
1983	2981	126	98	163	54.7
1982	2864	102	91	149	52.0
1981	3250	94	92	146	44.9
1980	3349	64	81	124	37.0
1979	3475	90	93	143	41.1
1979—1988	37542	1294	1117	1840	49.0

资料来源: Baldauf R. B., Methodologies for Policy and Planning. In R. B. Kaplan (ed.) The Oxford Handbook of Applied Linguistic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393.

中国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对语言规划与语言政策的研究也非常关注。通过登录“中国知网学术趋势”(http://trend.cnki.net),以“语言政策”为关键词搜索,发现学术界对这一领域的关注度近年来(1994—2006)不断上升^①(如图 1.1 所示)。

近年来中国的语言规划研究取得了重要的研究成果,出版了

^① 中国知网学术关注度是以 CNKI 知识资源总库中与关键词最相关的文献数量为 basis,统计关键词作为文献主题出现的次数,形成的学术界对某一学术领域关注度的量化表示。笔者以“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为关键词都进行了搜索,“语言规划”搜索结果显示数据不足,图 1.1 显示的是“语言政策”的搜索结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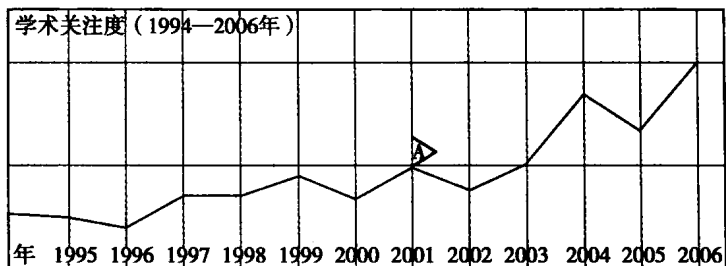


图 1.1 语言规划与语言政策学术关注度

一些代表性著作。如李宇明（2005）的《中国语言规划论》对中国语言规划涉及的主要方面进行了深刻分析，探讨了中国语言生活和语言文字工作、语言文字的规范标准、领域语言问题及学术规划、切音字运动研究等重要内容。陈章太（2005）的《语言规划研究》则对语言规划的基本理论问题、语言立法、当代中国的语言规划等问题进行了深入阐述。周庆生（2001，2003）的《国外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进程》及《国家、民族与语言——语言政策国别研究》对国外的语言规划与语言政策进行了大量介绍和探讨，对了解和借鉴国外语言规划与语言政策进程非常有帮助。《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系列著作对语言规划也进行了重点研究。

此外，周玉忠、王辉（2004）、姚亚平（2005），教育部语用所（2006），郭龙生（2008）等对中国语言规划的理论与实践进行了有益的梳理、总结和探索。蔡永良（2003，2007）探讨了美国的语言政策与语言教育。

李宇明、陈章太、周庆生、刘海涛等学者还发表了一批重要的语言规划与语言政策研究方面的论文。

但是，就澳大利亚的语言规划与语言政策而言，国内外的研究都很不够。国外的研究相对多一些。代表性的著作有 Ozolins（1993）的《澳大利亚的语言政治》（*The Politics of Language in Australia*）。该书以民族、语言、政治之间的关系为线索，探讨了